

戴震

生平与作品考论

戴震是中国十八世纪的一位大学者和大思想家。
两百多年来，研究戴震的学者很多，
著作、论文也不少。

不过，由于戴震个性鲜明、思想大胆、学问精博，
所以在关于戴震的研究中也留下了不少有争议的问题，至今悬而未决。

本书主要就是以这些有争议的问题作为考察对象，
诸如戴震的背师问题，戴校《水经注》问题，
戴震的义理成就，戴震反理学思想的成因，

戴震与徽州同学的关系，
戴震与钱载的交恶、与钱大昕的交往、与彭绍升的辩论，
戴震《屈原赋注》后《音义》三卷的撰者问题，
戴震转语理论的内涵及《转语二十章》的成书问题，等等。

蔡锦芳◎著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戴震

生平与作品考论

蔡锦芳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戴震生平与作品考论/蔡锦芳 著.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6

ISBN 7-5633-6139-1

I. 戴… II. 蔡… III. ①戴震(1723~1777)
—人物研究②戴震(1723~1777)—文学研究
IV. B249.65②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65926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育才路 15 号 邮政编码:541004)
网址:<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肖启明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

(山东省临沂市高新技术开发区工业北路东段 邮政编码:276017)

开本:890mm×1 240mm 1/32

印张:10.5 字数:260 千字

2006 年 6 月第 1 版 200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30.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电话:0539-2925659)

导 论

戴震,字慎修,又字东原,生于雍正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1724年1月19日),卒于乾隆四十二年五月二十七日(1777年7月1日),安徽休宁(今安徽黄山市屯溪区)人,是十八世纪中国的大学者和大思想家。

戴震家境贫寒,父亲戴弁是一个不太会做生意的小布商。虽然戴震十岁才会说话,但他聪明好学,十多岁就传读书时,常常能提一些让塾师难以回答的问题,此后戴震主要依靠自学。十七岁的时候,他已经有志于闻道,“谓非求之六经、孔孟不得,非从事于字义、制度、名物,无由以通其语言”^①。于是取《说文解字》、《尔雅》、《方言》、《十三经注疏》等书详加研求,终于尽通前人古义。大约在乾隆七年(戴震20岁时),戴震结识了经学大师江永。江永精于三《礼》、步算、钟律、声韵、地名沿革,戴震与之一起讲贯《礼经》制度、名物及推步天象等,皆能洞彻其本原。乾隆十五年(1750)至十六年间,淳安方黎如来徽州府主紫阳书院讲席,戴震曾从之问作文之法。乾隆十六年(1751),二十九岁的戴震补休宁县学生。十七年,休宁大旱,戴家生计艰难,戴震仍闭户苦注《屈原赋注》。该年秋,馆于汪梧凤家不疏园,教其子汪灼。十八年,江永亦至。这一段时间,戴震与同学好友程瑶田、方晞原、郑牧、汪肇龙、金榜、汪梧凤一起,从江永讲经论学,大家均获益匪浅。乾隆十九年甲戌春,戴震因祖坟问题,与族豪打官司,结果县令得族豪贿赂,反欲加罪戴震,致使戴震为避仇而匆忙入京。除了随身携带的几本著作以

^① 段玉裁:《戴东原先生年谱》“乾隆四年,十七岁”下,赵玉新点校:《戴震文集·附录》,页217,中华书局1980年版。

外,行李衣服都没有,狼狈至极。在京城,由于得到了钱大昕等人的欣赏和提携,学已有成的戴震很快便声名大振,名流学者秦蕙田、朱筠、纪昀、王鸣盛、卢文弨、王昶等皆来折节与之交往。在京期间,曾馆高邮王文肃公安国第,教其子王念孙,据刘盼遂《王氏父子年谱》云:“文肃公兼管工部尚书事,延戴东原馆于家,命先生(王念孙,时十三岁)从受经。……先生相从一年,而稽古之学遂基于此矣。先生尝问东原曰:‘弟子将何学而可?’东原沉思久之曰:‘君之才竟无所不可也。’”^①后王念孙终成一代训诂大师。

乾隆二十二年冬,戴震自京南还,在扬州两淮盐运使卢见曾署内结识了经学大师惠栋(时惠栋已经六十岁,第二年便逝于苏州),惠栋尊崇汉学鄙视宋学的态度对戴震的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二十七年,戴震中江南乡试。同年,江永去世,戴震为撰《江慎修先生事略状》,并整齐其遗书。二十八年,经扬州入都会试,不中,居新安会馆讲学,段玉裁开始从之受教。三十一年,从江南经苏州、扬州再次入京参加会试,不第。馆于裘曰修府第,教其子裘行简。三十三年,应直隶总督方观承之聘,前往保定为校《直隶河渠书》。校事未毕,方观承去世,戴震辞去。三十四年,第三次入都会试,不第。同年夏,应朱筠之弟朱珪之聘,与段玉裁一起同往山西,段玉裁主讲寿阳书院,戴震留朱珪署内。曾假病十余日,起而对朱珪说:“我非真病,乃发狂打破宋儒家中《太极图》耳!”^②后受汾州太守孙相和之聘修《汾州府志》。三十六年,第四次入都参加恩科会试,不第。回汾阳修《汾阳县志》。三十七年,自汾阳入京,第五次参加会试,不第。南还主讲浙江金华书院,刊自定《水经注》。三十八年,因纪昀、裘曰修的推荐,以举人身份被特召,入四库馆充纂修官,在馆勤修职事,释疑解惑。三十九年,《水经注》校成,受到皇上褒奖。四十年,第六次参加会试,不第,奉命与该年贡士一体殿试,赐同进士出身,授翰林院庶吉士。在馆主要纂校天文、历算、《礼》经方面的著作。四十一年春患足疾后,仍孜孜校书、著书,《孟子字义

① 刘盼遂:《王氏父子年谱》,页4,《丛书集成续编》据《段王学五种》本排印。

② 见段玉裁:《答程易田丈书》,《经韵楼集》卷七,道光元年(1821)刊本。

疏证》、《方言疏证》、《声类表》等均成于晚年。四十二年五月二十七日,由于误服了庸医所开的黑山栀,一代大师因足疾病逝,年仅五十五岁。戴震去世后,京师的同志送给他的挽联这样写道:“孟子之功,不在禹下;明德之后,必有达人。”^①戴震的灵柩由戴震的夫人朱氏和儿子中立扶持南归。

戴震为人,修干轩伟,强识锋辩,声如洪钟,目光炯炯射四座。虽迫于生计,辗转游幕,却一生勤于著述,作品颇丰。不过,由于多未定稿,且散佚严重,所以整理起来很不容易。比较重要的刻印主要有如下几次:

戴震刚去世不久,其亲家曲阜孔继涵(戴震的女儿嫁给孔继涵的长子孔广根)便着手刻印《戴氏遗书》,自乾隆四十二年到四十四年(1777~1779),共刻戴震亲撰著作十五种,校勘著作十一种,收入《微波榭丛书》。孔广森、卢文弨为《遗书》作序。

乾隆五十七年(1792),段玉裁经韵楼刻《戴震文集》十二卷,比《戴氏遗书》中所收《戴震文集》多两卷。

民国二十六年(1937),《安徽丛书》第六期出版《戴东原先生全集》三十六册,共收戴震著作二十二种。前有许承尧序以及胡朴安著《戴先生所著书考》一卷。

1961年,北京中华书局出版《孟子字义疏证》、《原善》、《绪言》、《孟子私淑录》四种,由何文光整理。

198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戴震集》上、下编,上编为《东原文集》,下编收《孟子字义疏证》、《原善》、《绪言》、《孟子私淑录》四种,由汤志钧校点。

1994至1997年,黄山书社出版张岱年主编的《戴震全书》七册,列入《安徽古籍丛书》第二辑,所收颇多。

1991年至1999年,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由戴震研究会等单位编纂的《戴震全集》六册,这是迄今为止收录戴震著作最为全面的一个版

① 见段玉裁:《戴东原先生年谱》,赵玉新点校:《戴震文集·附录》,页245。

本。其中有不少是编纂过程中才陆陆续续新发现的戴震手稿和逸文，因而弥足珍贵。该《全集》第一册收哲学、天文、历法、地理方志类著作，包括《原善》初稿三篇，《原善》扩编本三卷，《孟子私淑录》三卷，《绪言》三卷，《孟子字义疏证》三卷，《原象》一卷，《续天文略》二卷，《水地记》一卷及若干单篇文章。第二册收数理、诗赋考证等著作，包括《策算》（无卷数），《句股割园记》（无注）三篇，《句股割园记》（有注）三卷，《九章算术订讹补图》八篇，《考工记图》二卷，《屈原赋注初稿》三卷，《屈原赋注》十二卷，《杲溪诗经补注》二卷，《毛郑诗考正》（无卷）及若干单篇文章。第三册收经书考证类著作，包括《经考》五卷，《经考附录》七卷，《尚书义考》二卷，《深衣解》一卷及若干单篇文章。第四册专收《戴氏诗经考》二十六卷。第五册收音韵、训诂类著作，包括《经雅》七篇，《声韵考》四卷，《方言疏证》十三卷，《续方言手稿》二卷，《声类表》九卷及众多单篇文章。第六册则是拾遗补缺，并附录有关戴震的传记资料。以前《戴震文集》中的单篇文章，在此《戴震全集》中已分散至内容相关的各分册中。

从上面所列戴震的著作，我们可以看出，戴震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他的学问不仅广博，而且精深。关于戴震及其作品的研究和评价，可以说在其生前就开始了。历经两百多年以后，戴震的许多方面都得到了比较深入的研究，而且研究他的学者，许多都是大师级的人物，这些人物包括章太炎、梁启超、胡适、王国维、钱穆、侯外庐、冯友兰、张舜徽、黄侃、王力等。他们高屋建瓴的研究，对于我们准确把握戴震思想、学术的精华，起到了很好的引领作用。不过，由于戴震是一位特立独行、个性鲜明的学者和思想家，所以对他的研究历来都充满了争议。正是这些纷扰复杂的争议，引起了笔者浓厚的兴趣，总希冀着把其中的有些问题能弄个水落石出，或者能从新的角度提出一点新的解释。在这些争议中，一个首要的问题是，到底该怎么看待戴震的义理成就，亦即戴震的哲学思想？戴震自己认为，他的《孟子字义疏证》是“生平著述最大者”。然而，当时以朱筠、钱大昕为代表的汉学家们，看重的就只是戴震在六书九数、名物训诂等方面的考据功力，而对戴震在义理方面的执著追求则不能理解。章学诚《答邵二云书》云：

“时在朱先生门,得见一时通人,虽大扩生平闻见,而求能深识古人大体,进窥天地之纯,惟戴可与几此。而当时中朝荐绅负重望者,大兴朱氏、嘉定钱氏实为一时巨擘。其推重戴氏,亦但云训诂名物、六书九数用功深细而已。及见《原善》诸篇,则群惜其有用精神耗于无用之地。”^①戴震去世后,洪榜撰《戴先生行状》,为了表彰戴震的义理之学,特地将戴震的《答彭进士允初书》全文载入,结果朱筠看了,很不以为然,说:“可不必载,性与天道不可得闻,何图更于程朱之外复有论说乎?戴氏可传者不在此。”^②对戴震的义理之学能够理解的,当时只有洪榜、章学诚等少数学者。更多的却是程朱理学的卫道者,如翁方纲、姚鼐、程晋芳、方东树等人,均起而攻击戴震的义理,有的甚至发展为恶毒的人身谩骂。如翁方纲《理说驳戴震作》一文中云:“近日休宁戴震一生毕力于名物象数之学,博且勤矣,实亦考订之一端耳。乃其人不肯以考订为事,而欲谈性道以立异于程朱。”^③姚鼐《再复简斋书》云:“儒者生程朱之后,得程朱而明孔孟之旨。程朱犹吾父师也。程朱言或有失……正之,可也。正之而诋毁之,讪笑之,是诋讪父师也。且其人生平不能为程朱之行,而其意乃欲与程朱争名,安得不为天之所恶?故毛大可、李刚主、程绵庄、戴东原,率皆身灭嗣绝,此殆未可以为偶然也。”^④后世对戴震的义理能够给予一定的理解并略有阐发的,有焦循、汪中、阮元、孙星衍、凌廷堪、黄式三、戴望等。

二十世纪以后,戴震的哲学思想受到了空前的重视。首先是章太炎,正如钱穆所说,“近儒首尊东原者自太炎”^⑤。他的《释戴》、《学隐》、《说林》及《清儒》等文启发了近人研究戴震学术的浓厚兴趣。章太炎尊戴,主要是出于反满的需要,他认为雍正那样的酷虐是理学助成的,而戴震的哲学正好是反酷虐、反理学、提倡平恕的。章太炎《说林》上云:“戴君生雍正乱世,亲见贼渠之遇士民,不循法律,而以洛、闽

① 张岱年主编:《戴震全书(七)·附录》,页157~158,黄山书社1997年版。

② 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卷六“洪榜”条,页97,中华书局1983年版。

③ 翁方纲:《复初斋文集》卷七,《续修四库全书》据清李彦章校刻本影印。

④ 姚鼐:《惜抱轩文集》卷六《再复简斋书》,《四部丛刊》本。

⑤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八章“戴东原”,页396,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之言相稽。哀矜庶戮之不辜，方告无辜于上，其言绝痛。”又《释戴》篇云：“震自幼为贾贩，转运千里，复具知民生隐曲，而上无一言之惠，故发愤著《原善》、《孟子字义疏证》，专务平恕，为臣民愬上天。明死于法可救，死于理即不可救。”^①当然，以朴学立根基的章太炎也论及了戴震的治学方法和治学成就等。把乾嘉朴学分成两个大的学派，一个是以惠栋为代表的吴派，一个是以戴震为代表的皖派，并联系地域特征归纳他们各自的特点，就是章太炎的发明。受他的影响，当时刘师培、王国维、蔡元培等人对戴震的哲学思想也都有表彰和论说，有的还将戴震与西方的卢梭、孟德斯鸠相比。但表彰最力者，当推梁启超和胡适。他们二人出于反封建的启蒙需要，不遗余力地大力宣传戴震的反理学、重情欲的哲学思想。他们以戴震的二百周年诞辰纪念为契机（癸亥十二月二十四日，公历1924年1月19日），掀起了一个研究戴震思想学术的高潮。两人都有《戴东原的哲学》论著问世。梁启超通过将戴震的思想与西方文艺复兴时代的思潮相比较，强调了戴震哲学中注重情感和平等的精神。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云：“《疏证》一书，字字精粹……综其内容，不外欲以‘情感哲学’代‘理性哲学’。就此点论之，乃与欧洲文艺复兴时代之思潮之本质绝相类。盖当时人心，为基督教绝对禁欲主义的束缚，痛苦无艺，既反乎人理而又不敢违，乃相与作伪，而道德反扫地以尽。文艺复兴之运动，乃采久淤室之‘希腊的情感主义’以药之。一旦解放，文化转一新方向以进行，则蓬勃而莫能御。戴震盖确有见于此，其志愿确欲为中国文化转一新方向。其哲学之立脚点，真可称二千年一大翻案。其论尊卑顺逆一段，实以平等精神，作伦理学上一大革命。其斥宋儒之糅合儒佛，虽辞带含蓄，而意极严正，随处发挥科学家求真求是之精神，实三百年间最有价值之奇书也。”^②胡适与梁启超步调一致，也强调戴震哲学中重情欲的思想，并充分肯定戴震痛斥宋儒“以理杀人”的进步意义。但胡适还有一个

① 见傅杰编校：《章太炎学术史论集》，页322，页356，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

②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十一，页38~39，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

目的,即通过对颜元、戴震等人思想的宣传,来改造一种科学的致知穷理的中国哲学,所以胡适比较强调戴震是以考据学的科学精神来从事其“建设新哲学”的大事业的。胡适说:“打倒程朱,只有一条路,就是从穷理致知的路上,超过程朱,用穷理致知的结果来反攻穷理致知的程朱。戴震用的就是这个法子。”^①胡适对戴震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地位评价极高,他说:“人都知道戴东原是清代经学的大师、音韵的大师、清代考核之学的大师。但很少有人知道他是朱子以后第一个大思想家、大哲学家。他在经学考据的方面,虽有开山之功,但他的弟子王念孙、段玉裁等人的成绩早已超过他了。他在哲学的方面,二百年来,只有一个焦循了解得一部分;但论思想的透辟、气魄的伟大,二百年来,戴东原真成独霸了!”^②对此,钱穆表示了明显的不满。钱穆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与梁启超的书故意同名,即因“与任公意见相异,故特开此课程,自编讲义”^③。书中关于戴震的评价,有不少其实都是针对梁、胡二人而发的。钱穆站在尊崇宋学的立场,通过对戴震学术思想渊源的考辨、对戴学的反响的重新梳理、对戴震心术的重新剖析,提出了一系列与梁、胡二人针锋相对的观点。^④并说:“近人所以盛推戴东原,以东原高提人欲,人欲与奢侈相通,亦谓由是可以企及西洋之文明也。”^⑤钱穆对梁、胡将以戴震为代表的清儒的考据方法提升到“科学方法”的高度也很不以为然,他说:“近世盛推清代汉学家尚证据,重归纳,有合于欧西所谓科学方法者。其实此风源于明代,由一种分类钞书法,而运用之渐纯熟,乃得开此广囿也。”^⑥“朱子格物,在即凡天

① 胡适:《戴东原的哲学》三,页60,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② 胡适:《戴东原在中国哲学史上的位置》,《戴东原的哲学》附录,页144。

③ 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合刊》,页141,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6年版。

④ 参见刘巍:《钱穆与胡适、梁启超关于清代学术史整理的思想交涉——以戴震研究为例》,收入《青年学术论坛》1999年卷,页236~272,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⑤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十四章“康长素”,页780~781,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⑥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四章“顾亭林”,页174。

下之物而格,今则只求即凡六经之名物训诂而格耳。清儒自阎百诗以下,始终不脱读书人面目,东原汉学大师,又承江永门墙,最近朱子格物一路,然亦只格得六经书本上名物,仍是汉学家精神也。”^①所以,侯外庐说:“以著者所知,提出了与适之、任公相反的评价者,是钱穆氏。钱先生在其所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研究东原,似针对了适之的东原哲学,故一方面是宣扬,而他方面是低抑,适成对立。”侯外庐本人对戴震的哲学评价也不高,他说:“我们认为十七世纪的成就是伟大的,并不是清代中叶(18世纪)的准备基础。反之,乾嘉时代的哲学不是清代学术的全盛期,而仅仅是清初传统的余绪(极小限度的发展)。这一点,梁、胡都把历史颠倒了。因此,戴震哲学就不是‘新哲学的建设’或‘哲学的中兴’,而仅仅是在有限范围内对清初哲学的继承。”^②王国维虽然先前也对戴震的哲学表示过兴趣,如他在《国朝汉学派戴阮两家之哲学说》一文中这样说道:乾嘉学术与东汉比隆,“然其中之巨子亦悟其说之庞杂破碎无当于学,遂出汉学固有之范围外,而取宋学之途径,于是孟子以来所提出之人性论复为争论之问题。其中之最有价值者如戴东原之《原善》、《孟子字义疏证》,阮文达之《性命古训》等,皆由三代秦汉之说以建设其心理学及伦理学。其说之幽远高妙,自不及宋人远甚,然一方复活先秦之古学,一方又加以新解释,此我国最近哲学上唯一有兴味之事,亦唯一可纪之事也”。当时王国维还对段玉裁评论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以六经、孔孟之旨还之六经、孔孟,以程朱之旨还之程朱,以陆王佛氏之旨还之陆王佛氏”击节赞叹,说:“诚哉此言也。”^③但后来由于对胡适等人的某些做法和宣传很反感,也就连带改变了他对戴震的看法,态度竟从品味一变而为指责。王国维在《聚珍本戴校水经注跋》中说:“(戴震)一生心力,专注于声音训诂名物象数,而于六经大义,所得颇浅。晚年欲夺朱子之席,乃撰《孟子字义疏证》等书,虽自谓‘欲以孔孟之说,还之孔孟,

①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八章“戴东原”,页348。

② 侯外庐:《近代中国学术思想史》,页387,生活书店1947年版。又《中国思想通史》第五卷《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页461,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③ 《王国维遗书》第三册,页482~492,上海书店出版社1996年版。

宋儒之说,还之宋儒’,顾其书虽力与程朱异,而亦未尝与孔孟合。”^①综观现代学术史上的这一些争论,论争各方其实都是在一定的文化背景和社会背景下来发表他们的学术见解的,因而其学术见解特别是关于哲学思想方面的,都深深地打上了其所处的那个时代的烙印。功利性强了,离学术的客观认知就有一定距离了。

到底该如何评价戴震的反理学的哲学成就?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后,许多学者都来撰文发表自己的意见,大家对戴震哲学的本体论、人性论、认识论、伦理观及戴震哲学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地位等方面都做了比较深入的研究。总的来说,评价都很高。同时,学者们对戴震哲学的思想渊源也做了多方面的考察。这当中,钱穆的学生、美籍华裔学者余英时则独辟蹊径,从儒家“道问学”传统即儒家智识主义的兴起和发展的角度,来重新审视以戴震为代表的清代考据学思潮,充分肯定了其在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引起了学者们的高度重视,余英时说:“清儒决不是信手摭取某一段经文来施其考证的工夫,至少,在考据学初兴之际,他们对考证对象的选择是和当时儒学内部的某些重要的义理问题分不开的。下逮乾嘉之世,由于儒家的智识主义逐渐流为文献主义,不少考证学家的确已迷失了早期的方向感。但当时考证运动的两大理论代言人——戴东原和章实斋——则仍然能紧紧地把握住清代思想史的方向。”“如果我们坚持以‘心性之学’为衡量儒学的标准,那么不但在清代两百多年间儒学已经僵化,即从秦汉到隋唐这一千余年中儒学也是一直停留在‘死而不亡’的状态之中。相反地,如果我们对儒学采取一种广阔而动态的看法,则有清一代的‘道问学’传统正可以代表儒学发展的最新面貌。尤其重要的是这个新的发展恰好为儒学从传统到现代的过渡提供了一个始点。”“依我个人的偏见,清儒所表现的‘道问学’的精神确是儒学进程中一个崭新的阶段,其历史的意义决不在宋明理学的‘尊德性’之下。”^②

① 见《观堂集林》卷十二,《王国维遗书》第一册,页594~596。

② 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自序》,《论戴震与章学诚》卷首,三联书店2000年版。

基于以上的研究状况,围绕着戴震的哲学思想,笔者写了四篇文章。第一篇是《论戴震的经世之志》,该文重在揭示戴震不仅是一个考据家,而且是一个始终有着强烈经世之志的思想家,他为实现自己的经世之志做了多方面的艰苦努力,而为了“正人心”才撰写的《孟子字义疏证》等著作,则是他这种努力过程中的最后一环。我以为从经世的角度来考察戴震的义理,更能够看清楚其义理的价值以及其人格的魅力。第二篇是《论戴震避仇入京等生活经历对其理欲观的影响》,考虑到以前的学者们在论及戴震哲学思想的成因的时候,总喜欢到历史上去寻找各种各样的思想渊源,这些思想渊源包括荀子、张载、陆九渊、明末清初的浙东学派、清初的颜李学派、程廷祚等。而这对于一个眼光总是盯着现实、心中关注着百姓苦痛的思想家来说,肯定是不够的。所以笔者决定去追踪戴震的生平经历,结果发现,原来因祖坟问题而避仇入京一事紧紧地缠绕了戴震好多年(至少5年以上),给戴震的身心造成了长时间的巨大伤害,而此事件恰恰是一起典型的尊者、贵者、长者“以理杀人”,而卑者、贱者、幼者无理可申的事件,因此我们认为此事件对戴震喊出“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的反理学最强音有着直接而重要的影响。历史上反理学的思想家不止一个,为什么只有戴震才能喊出如此振聋发聩的声音,这应该是令人深思的。紧密联系戴震的生活环境和时代环境去考察,应该是非常必要的。该文同时也考察了徽州妇女节烈风气对戴震哲学思想形成的影响。第三篇是《戴震扬州生活经历考》,虽然不少学者认为戴震在扬州的几年生活经历对戴震日后的思想转变产生了重要影响,但戴震在扬州到底生活了多长时间,结识了哪些人,做了哪些事,人们并不能言其详。我们在这篇文章中首先基本弄清楚了戴震在扬州的生活时间,然后就戴震在扬州所做的事和所结识的人,考察了戴震可能受到的多方面的影响。我们认为戴震受到的影响,既有来自惠栋的对宋儒治学方法的否定,又有来自程廷祚的对宋儒义理的否定;既有来自吴敬梓的对程朱理学害人至深的形象控诉,又有来自郑板桥的学者当自树旗帜的倡导。这些影响与其他的影响会聚在一起,激荡融合,终于使年轻敏感的戴震逐渐形成了反程朱理学的世界观。第四篇是《从戴震与彭绍升的交往

看乾嘉士林中的儒释之辨》，戴震的《答彭进士允初书》是理解戴震哲学思想的重要文献，可是关于戴震与彭绍升这一番书信往来所反映出来的那个时代思想界两股思潮——严辨儒释和调和儒释之间的碰撞，迄今未见有人作系统的论述。本文便尝试着在当时思想界的大背景下来考察戴震与彭绍升之间的思想交锋，以便更好地理解戴震思想的时代意义。（本文对彭绍升中进士的确切时间也作了考辨）

在前人关于戴震的研究中，另一个惹人注意的有争议的问题是戴校《水经注》问题，即戴震校《水经注》时有没有剽窃赵一清校《水经注》的成果？这个问题因为王国维、胡适的参与，一直是戴学研究中的一个热点问题，学者们讨论的文章也很多。最近几年人们讨论的主要问题是，胡适花了二十年时间到底有没有找到足够的证据为戴震洗刷掉沉冤？有学者认为胡适的证据和研究已足以证明戴窃赵案不成立，如方利山、鲍国顺等^①；也有人仍然认为胡适的努力不足以证明戴震没有窃赵，如陈桥驿、桑兵等^②。笔者现在没有精力和条件像胡适那样去做仔细的甄别工作，因此无法肯定此案到底能否成立。不过胡适的一个见解倒是启发了我去进一步思考。胡适说：“张穆、魏源、孟森、王国维他们为什么骂十八世纪一位了不得的大哲学家是贼呢？因为戴东原是当时思想的一个叛徒，批评宋明理学，批评程子、朱子。”^③又说：“我总觉得王、孟诸人攻击东原窃书一案的背后不免有几分‘卫道’、‘护法’的背景。其意若曰：‘戴东原欲夺朱子之席，总不是个好东西，

① 方利山：《三谈胡适重申水经注学术公案——兼与桑兵教授商榷》，收入周绍泉等主编《'98 国际徽学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页 497～511，安徽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鲍国顺的观点，见其所著《戴震研究》上篇第二章“著作”类，页 106～124，1997 年台北“国立”编译馆出版。

② 陈桥驿：《论胡适研究水经注的贡献》，《胡适研究丛刊》，页 71～87，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6 年版。桑兵的观点，见其所著《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第十章“胡适与水经注案探源”，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年版。

③ 胡适：《水经注考》，1953 年 12 月 19 日台大演讲，见《胡适演讲集》上册，页 86，台北 1986 年版。

什么可忌可耻之事,他都做得出来,这并不奇怪!’”^①我们以为胡适的说法是有几分道理的。如果我们回顾一下戴窃赵案的缘起,就会发现,在对戴震窃书的指责中,从张穆到魏源再到王国维,一直都夹杂着对戴震的心术及戴震的背师的指责。张穆《全氏水经注辩诬》一文云:“今世之读《水经注》者,必主戴震本,次则赵一清本,穆案两家于此书皆不为无功,至凿山通道则谢山全氏之力为多,两家皆拾沈于全氏者也。一清治《水经》,谢山屡称之,而其书至乾隆丙午始刊行,在戴本既行之后十三年,然戴氏则必尝窥见全书及赵书,而窃据润饰以为己有也。戴以校正此书博世名、膺懋赏,其最得意者两端:一曰据《永乐大典》本也,一曰分别经注不相牵掣也。《大典》弃翰林院,获见者少,穆于辛丑之秋幸得亲览秘书,用明以来通行《水经》本校出一部,勘验戴书,始觉其诈。……使戴氏标明原本而删之补之,岂不甚美,何乃为此穿凿之行乎?尚论者所为深恶其人、悬为世戒也。”^②魏源《书赵校水经注后》一文云:“戴为婺源江永门人,凡六书、三《礼》、九数之学,无一不受诸江氏,有同门方晞所作《群经补义序》称曰‘同门戴震’可证。(按:方晞盖为方晞原,缺一‘原’字,查《皇清经解》本及《四库全书》文渊阁本,此序未见。)及戴名既盛,凡己书中称引师说,但称为‘同里老儒江慎修’而不称师说,亦不称先生。其背师盗名,合逢蒙、齐豹为一人。则攘他氏之书犹其罪之小者也。平日谈心性、诋程朱,无非一念争名所炽,其学术心术均与毛大可相符,江氏亦不愿有此弟子也。”^③王国维《聚珍本戴校水经注跋》一文云:“(戴震)平生学术出于江慎修。故其古韵之学根于等韵,象数之学根于西法,与江氏同;而不肯公言等韵、西法,与江氏异。其于江氏亦未尝笃在三之谊,但呼之曰‘婺源老儒江慎修’而已。”^④那么,他们一味指责的戴震的心术、戴震的背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① 胡适:《自述治水经注案缘起及论述片断》,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一册,页33,黄山书社1994年版。

② 见《全氏七校水经注·附录》,光绪十四年(1888)无锡薛氏校刊本。

③ 魏源:《魏默深遗文》,见周寿昌《思益堂日札》卷五,光绪十四年刊本。

④ 见《观堂集林》卷十二,《王国维遗书》第一册,页594~596。

原来,对戴震心术的指责,始于章学诚。章学诚《答邵二云书》云:“来书于戴东原自称《原善》之书欲希两庀牲牢语,往复力辩,决其必无是言。足下不忘死友,意甚可感!然谓仆为浮言所惑,则不然也。戴君虽与足下相得甚深,而知戴之深,足下似不如仆之早。……惟仆知戴最深,故勘戴隐情亦最微中,其学问心术,实有瑕瑜不容掩者。”^①而章学诚所谓戴震的“心术”,实指戴震出于程朱又背叛程朱。其《又与朱少白书》云:“戴东原训诂解经,得古人大体,众所推尊,其《原善》诸篇虽先夫子(指朱少白父亲朱筠)亦所不取。其实精微醇邃,实有古人未发之旨,鄙不以为非也。(原注:姚姬传并不取《原善》,过矣!)戴君之误,误在诋宋儒之躬行实践,而置己身于功过之外。至于校正宋儒之讹误可也,并一切抹杀,横肆诋诃,至今休、歿之间,少年英俊,不骂程、朱,不得谓之通人,则真罪过,戴氏实为作俑。其实初听其说,似乎高明,而细核之,则直为忘本耳。夫空谈性理,孤陋寡闻,一无所知,乃是宋学末流之大弊。然通经服古,由博反约,即是朱子之教。一传为蔡九峰、黄勉斋,再传而为真西山、魏鹤山,三传而为黄东发、王伯厚。其后如许白云、金仁山、王会之,直至明初宋潜溪、王义乌。其后为八股时文中断。至国初而顾亭林、黄梨洲、阎百诗皆俎豆相承,甚于汉之经师谱系。戴氏亦从此数公入手,而痛斥朱学,此饮水而忘其源也。然戴实有所得力处,故《原善》诸篇,文不容没。”^②后来方东树著《汉学商兑》,亦痛斥戴震的“心术”,方东树说戴震“盖由其私心本志憎忌程朱,坚欲与之立异,故力辟求理之学,大本一失,无往不差。然后知其所谓有志闻道欲求之六经、孔孟者,特托为重言以涂学人耳目,使人无疑其畔六经、孔孟也”。又说:“攻程朱者必无君子,心术邪也。”^③由此看来,对戴震心术的指责,完全是信奉程朱理学的人站在保守的卫道立场,对戴震的反理学思想的指责。而这一点,在今天看来,根本就不是什么心术问题,恰恰正是戴震的伟大之处。

① 张岱年主编:《戴震全书(七)·附录》,页157~158,黄山书社1997年版。

② 同上引书,页163。

③ 方东树:《汉学商兑》卷中之上,页275;又卷下,页400,三联书店1998年版。

关于戴震的背师,其实根源也基于戴震的反理学上。第一个指责戴震背师的人其实不是魏源,而是张穆。我们知道,戴震早年在徽州有一班同学好友,里面有个叫方晞原的,方晞原有两个儿子,长子起泰(字苍崖),次子起谦(字牧夫),起谦有一子叫印生,与张穆是非常好的朋友。当初张穆的爷爷张佩芳(字荪圃)于乾隆三十二年至三十六年任徽州府歙县知县期间,即与戴震留在徽州的那一帮同学好友(包括方晞原在内)交往密切。因此张家与方家也可以说是世交了。而张穆对戴震背师的指责,就出现在他为方晞原的二儿子方牧夫写的七十寿序中。其《方牧夫先生寿序》云:“在昔明经之士莫不重有家法,家法非一家之私言,即师法也。晋唐以下,师法乖异,人自为说,不复考古,于是学者不解师法何事,乃以儒业相承、一门世守者名之曰家学,子弟族姓至援是为荣辱,故今人之重家学几与晋魏重门阀等。徽州山盘水交,实产魁儒。本朝婺源江氏始以朴学为后进倡,一时从游卓然深造有称于世者三人:曰东原戴氏,曰槩斋金氏,其一则晞原方先生也。槩斋撰述未竟而歿,东原抗心自大,晚颇讳言其师。而晞原终已命为江氏之徒无异词,且即本江氏之学以衍为家学。……窃惟师法之不讲也久,江氏当雍正、乾隆之际,振刷而绍明之,六书、九数,分其一二端,辄成佳士,百余年来亦复稍衰矣。赖先生饫闻绪言,承绝学灵光,岿然推其家学师法以教乡人而绵世德,其泽固未有既乎。若夫更推先生之教于乘辂乘节之区,本家学为师法,是又先生所重有望于印生者也。试即以穆之言券之。”^①张穆在这里一方面指责戴震“抗心自大,晚颇讳言其师”,一方面又着意抬高方晞原家族“本江氏之学以衍为家学”。他这样做,显然非常影响戴震在江门的地位和形象。联想到张穆与方家的亲密关系,我们不能不怀疑张穆的言论可能受到方家的影响。而事实上方晞原虽然早年与戴震是好朋友,但因为恪守程朱理学,所以晚年对戴震的反程朱很不以为然。胡麋善《方晞原权厝志》云:“其为学,自汉注唐疏以泊宋五子之书,皆博涉遍观,择其善者,而不泥于一家,不波于一说。尝语余:‘孔门而后,言绝义乖,儒流灭裂,然人道所

① 张穆:《厚斋文集》卷二,咸丰八年(1858)戊午刊本。